

李莘 著

# 自为风气自变迁

河北霸州胜芳镇民间花会音乐民俗志

 中国电影出版社

李莘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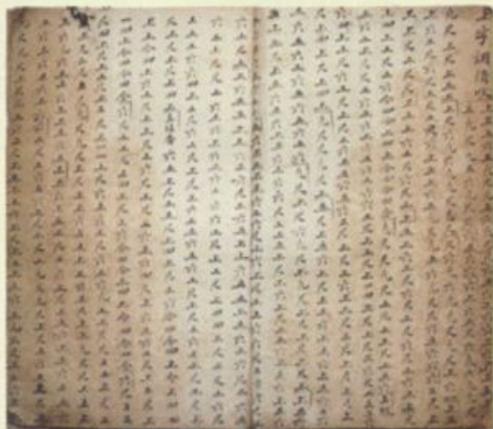
# 自为风气自变迁

河北霸州胜芳镇民间花会音乐民俗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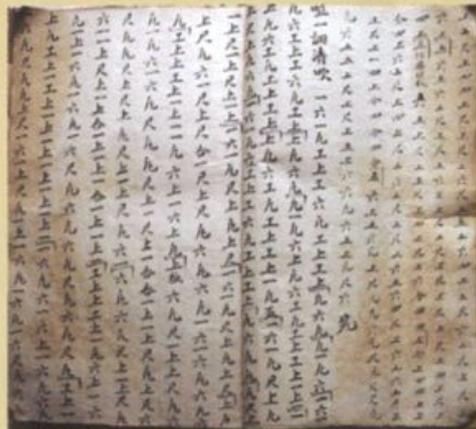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胜芳镇南音乐会老谱中大曲《清吹》七个调的工尺谱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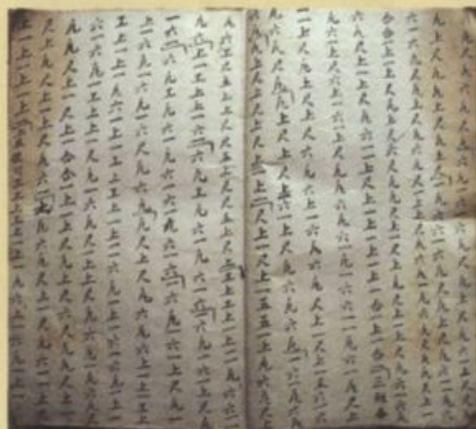
《上字调清吹》(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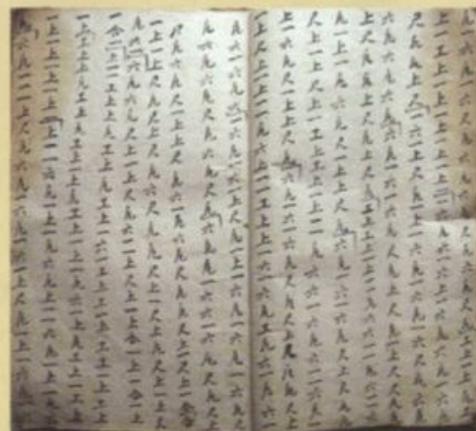
《哑一调清吹》(一)



《上字调清吹》(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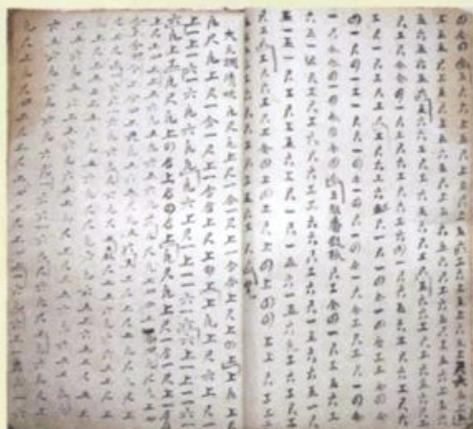


《哑一调清吹》(二)



《哑一调清吹》(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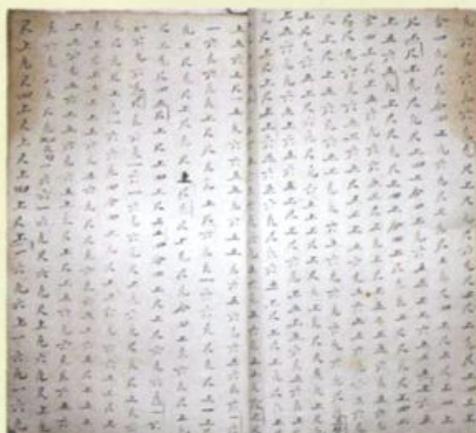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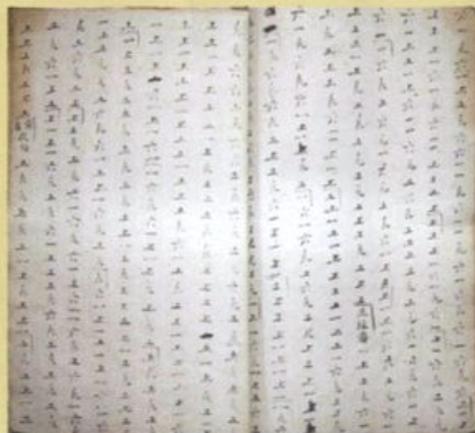
《大凡调清吹》（一）



《工字调清吹》（一）



《大凡调清吹》（二）



《工字调清吹》（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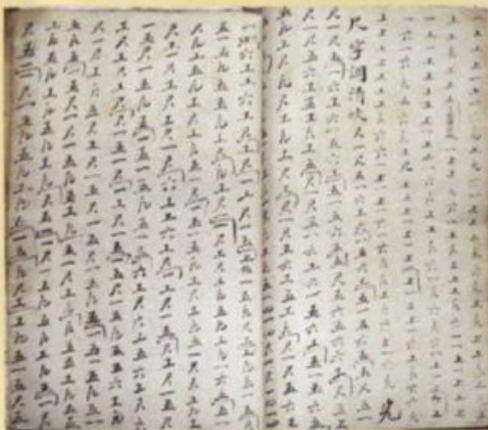


《大凡调清吹》（三）



《工字调清吹》（三）

胜芳镇南音乐会会头  
胡德明的八孔管子



《尺字调清吹》（一）



《尺字调清吹》（二）



《尺字调清吹》（三）



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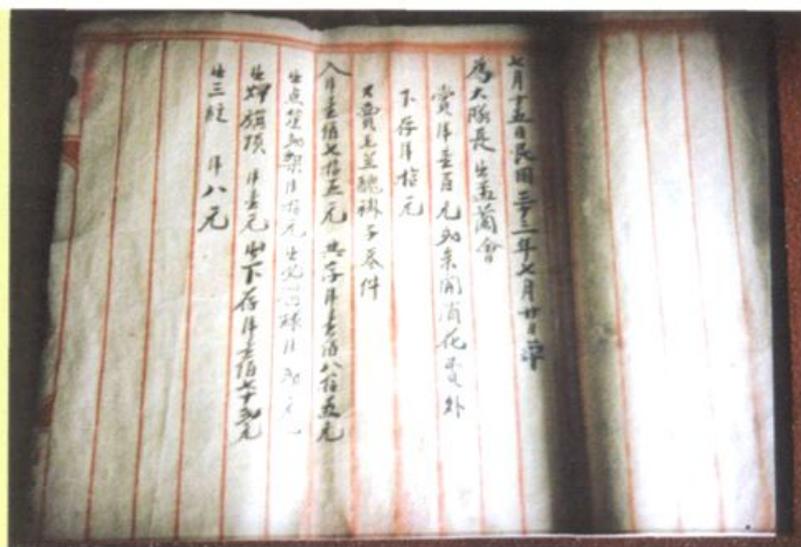


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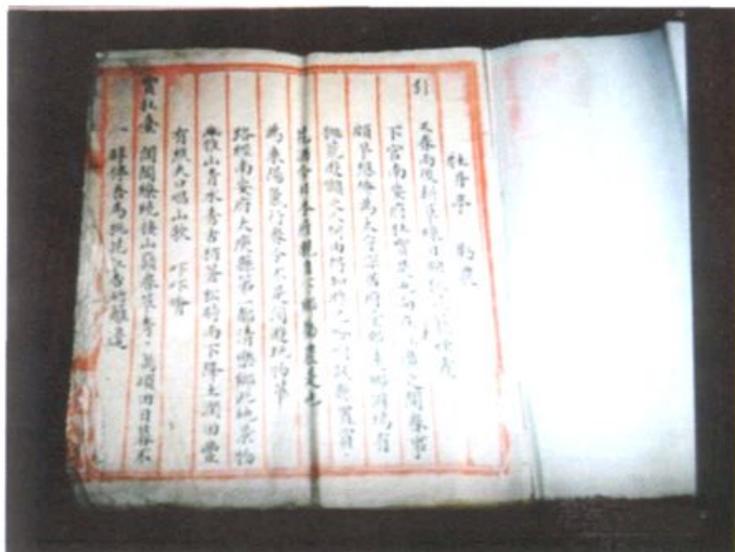
胜芳大会下属部分花会在摆会时互递的拜帖



胜芳镇渔樵耕读会在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记录的账目



胜芳镇渔樵耕读会保留至今的手抄本昆曲戏文《牡丹亭——劝农》



## 中文提要

本书的研究范围集中在河北省霸州市胜芳镇——一个位于京畿文化圈辐射范围之内的冀中地区中等规模农村社区,研究重点建立在对其中的民间会社组织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的综合田野考察实践上,以镇内由类别各异的会社联结而成的基层农村社区文化共同体——“花会”作为基本考察对象,并着重描述和分析胜芳镇花会中六个传统乐社的音乐活动和生存状态,将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在相对狭小的地域范围内集中并均匀分布、有着共同地域神崇拜的民间会社组织作为研究分析的核心内容。

此次研究建立在较为严格的田野工作基础之上,通过历史及具体现状考察,客观描述和分析会社内部会众特定的音乐文化生活及其相关事务、音乐文化传承、会社制度和组织结构,以及从中反映出的民间艺人对文化传统的认知、地域性文化在遭遇乡村城镇化社会转型过程中难以回避的矛盾和冲击时的反应、民间原生会社组织在延续变迁过程中的种种状态等,力求客观细致地描述华北普通乡镇的民间音乐组织与民间音乐文化生活的完整活态图景,并从民族音乐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角度对这些文化事象加以归纳和阐释,形成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书的论述基本上建立在“总述→微观分述→总述”的结构框架上,从宏观到具体再到宏观,叙议兼顾,夹叙夹议。

第一章以综述的形式铺陈胜芳镇的自然、历史、社会及宗教人文背景,以便为引入第二章“胜芳花会会社”的整体论述作好理论铺垫;第二章基本上是从民间组织和民间力量的联合体角度,对胜芳花会会社及其摆会活动进行从宏观到具体的阐述;第三章的论述更加微观,直接深入到个体会社的内部,以六个抽样调查的乐社个案分述不同乐社的特征及生存状态,兼顾音乐学和民俗学两种视角对各个研究主体进行深层理论挖掘和探究;第四章则是对前两章部分问题的归纳总结,从社会、经济以及行政角度阐释会社衰微的具体原因。

为了能够将研究者的论述与对研究对象的现场记录及口碑记录明确区分开,以免混淆主客观描述和判断,故而在书中试验性地引入了民俗学的“双窗口阐释法”,同时也是希望通过“双窗口阐释法”的运用,在研究乡土民俗文化的同时,反观、反思笔者自身的学术立场和研究得失。

## Abstract

The subject of the dissertation is focused on the folk musical associations in *Shengfang Town, Bazhou City, Hebei Province*, which are located in the middle-sized countryside communities of the central part of *Hebei Province* and included in the cultural circle of *Beijing* area. The basic research objects are the grass roots countryside cultural communities connected in different kinds and with different scales. Through synthesized field work of the folk musical associations in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the dissertation emphasizes on the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musical activities and existing state of the six traditional musical associations.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is about these folk communities distributing evenly over the relatively small regions, which have beliefs in common local gods and are linked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consanguinity and geo-ethnic connections.

Based on the strict field work and specific research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the dissertation objectively describes and analyses the specific cultural lives of the members in the associations, their interrelated affairs, the inheriting of musical culture, and the systems and framework of the communities. Through the objective analysis of the folk artists' apprehens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reflections of the unitary regional culture inevitably suffering conflicts and impacts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urbanization of countryside, and the descriptions of various existing forms of the original folk musical associations during the process interwoven with continuity and variation, the dissertation strives to present the complete and vivid panorama of the framework and the cultural lives of folk musical associations in ordinary towns of North China, and make interpretations and draw conclusions in the perspectives of ethnomusicology, sociology, anthropology, and folklore.

The dissertation is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summarizing-analyzing-summarizing”. Beginning with an introduction, chapter one expatiates *Shengfang Town's* natural, historical, social, and religious backgrounds with the purpose of foreshadowing chapter two theoretically. Chapter two expounds the activities of *Shengfang* Musical Associ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bination of local organizations and power. The discourse of chapter three is more specific. It penetrates into the individual association, and makes case studies of the six musical associations with spot check. It discusse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existing states of the associations respectively, and explores each research subject theoretically in the perspectives of musicology and socio-folklore. Chapter four makes a summary of the previous two chapters, and explains the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of the musical associations in the aspects of society,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The epilogue mainly expresses further reflections about the subject and the feelings of the research.

**Key words:** musical associations ethnomusicology  
folklore sociology

## 致 谢

本书从最初酝酿到最终成文,历时两年有余。其间,笔者依据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规范和要求,在搜集文献、田野考察和案头工作等方面都付出了一定的努力。但因笔者学术积累有限,书中必然有错误和偏颇之处,望诸位师友不吝赐教。本书能够完成,首先应当感谢那些热情帮助过我的众多民间音乐家和民俗当事人;感谢那些为学术领域提供了精辟见解而被本书所引用的诸多学者和前辈。

本书所研究的内容——河北霸州农村花会活动中民间乐社的音乐民俗,也是笔者的博士课题。笔者的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乔建中研究员,在指导笔者选题、实地田野考察和构思写作的全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并给予了笔者最真切的鼓励和言传身教。他始终注重在开拓学生思路和学术广度方面不拘一格、博采众长,提出了许多富于理论洞察力的修改意见。在最后一次田野考察中,为了能够让引用的材料更加充分详实,他冒着隆冬的严寒,放弃了春节的休假,亲自下乡指导笔者的田野工作,并专门为笔者的课题拍摄了大量珍贵的说明性图片资料,这些图片资料为课题研究提供了最为直接和有力的论据。笔者能够顺利完成此专著,其中倾注了导师无私奉献的智慧和汗水,以及他对学术一丝不苟、孜孜不倦的探求和对学子殷切的期望。在此笔者向导师表示真诚的谢意,并对他高尚的人格和学术品格致以崇高的敬意!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张振涛研究员、萧梅研究员和北京师范大学董晓萍教授不辞辛劳,认真审阅全书,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对于他

们的指导和鼓励，笔者深表谢意！

笔者还要特别感谢胜芳镇文化站的王乃让同志。从笔者第一次到胜芳做田野考察，就与这位在当地土生土长、德高望重的基层老文化干部结下了忘年之交。笔者在胜芳镇往复开展田野考察的一年多时间里，王乃让同志作为基层文化干部、民间文化的当事人和热心于民间文化传承发展的乡镇企业家，为笔者的采访研究工作提供了热情的支持、细致周到的帮助和诸多便利条件。他的热情豁达、对民俗生活的博闻广识以及对乡土的赤子之心，都令我感到由衷的钦佩和感动。对他给予我的全方位的热情帮助，我在此亦深表谢意！

在赴胜芳镇的实地考察过程中，笔者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热情接待和积极配合；他们为笔者的采访提供了珍贵的文字资料、口碑资料和音响、图片资料，这些资料是本书赖以成文的基础和关键。笔者在此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感谢胜芳文化站的杨永胜、邢志清、刘国和三位同志为笔者提供大量地方志资料，并给予笔者热情的接待。感谢胜芳花会的大会以及下属各会会众配合笔者的采访、拍照和录音，并为笔者热心提供了详实的口碑资料及音响资料。感谢学妹张欣冒着严寒、不辞辛苦地陪同笔者和导师下乡，承担了全部的DV摄录工作，从而保留下大量珍贵的影像资料。感谢师兄杨玉成在许多方面给予笔者的帮助和鼓励！感谢笔者的同事张延杰为本书承担英文编译工作！因为深知如果没有这些师长们和朋友们热情帮助和愉快合作，我是无法顺利完成此项课题研究的，亦不会有本书的问世，为此我对他们常怀感激之情。

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父亲和爱人给予我的理解和全力支持，也是我能够最终完成这一切的必要条件，我谨向所有的亲人表示深深的谢意！

# 前 言

本书的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乡村乐社,遍布于冀中平原的广大农村地区,是一种以音乐技艺的传承与表演为纽带而形成的、具有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先赋性整合”<sup>①</sup>机制特征的民间社会组织或社会团体。本课题的研究主旨,就是要以河北省霸州胜芳镇花会中的乐社为考察重点,围绕会社组织的诸方面特征,展开相关音乐本体和民俗文化生存背景的一系列探讨。

## 选题缘起、研究动机及研究目的

音乐学界对于冀中地区农村乐社的关注和研究,起始于由“智化寺京音乐”专题导引出的对河北民间鼓吹乐社“音乐会”的长期综合性探讨。如果从该研究日见规模的20世纪80年代算起,到目前已有二十余载,并积累了相当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笔者在求学期间也曾尝试撰写过关于冀中民间鼓吹乐社“音乐会”的专题个案,并在其后的日子里对此项课题始终保持着相当浓厚的兴趣,一直在关注着这方面的研

---

<sup>①</sup> 引自孙立平:《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中国传统社会的先赋性整合机制,存在于所有的社会关系体系模式之中,是传统社会结构高度稳定和巩固的重要条件。冀中乐社的组织结构也正是这种整合机制的缩影。

究成果。

此次,将河北霸州农村花会活动中民间乐社的音乐民俗研究作为作者的博士课题,正是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在吸纳学界前辈就“音乐会”专题研究积累的丰硕成果的同时,不拘于“音乐会”单种会社类型已有的研究模式,以农村不同种类乐社的文化共生形态及民俗活动特点作为具体的切入点,进行相对广泛和深入的定点考察与研究阐释。以乐社民俗作为研究切入点,是受到了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所著《妙峰山》一书的启发。正如《妙峰山》“序”中容肇祖先生所言:“(以往的民俗记录)大部分都是随兴所至的作品,凭记忆的比凭实地调查的记录为多,……我们仍希望最详细的调查和带研究性的记录,……这部《妙峰山》的出现,正好给我们研究民俗的朋友一个警告而有应行继续努力的必要。”“妙峰山”香会的民俗调查开展于1925年,之后我国的民俗学研究及实地田野考察传统正如容肇祖先生所希望的那样,通过继续努力而获得了持久的发展,并积累了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和学术成果。相互对照之下,音乐学界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与民俗学研究在考察对象上经常会形成重叠交叉,两种学科面对同样的研究客体。但在综合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广度、深度和学科体系建设的成熟性上,音乐学研究与民俗学研究还有一定的差距。

无论是顾颉刚研究的“香会”,还是“冀中音乐会”以及笔者此次的研究对象“胜芳镇民间花会”,它们虽然在称谓或民俗功能上略有不同,但其本质相同,都是冀中地区的民间会社组织。所以,不同学科关于不同种类的“会”的研究,彼此都是可以借鉴和互用的。如果说“冀中音乐会”的专题在研究角度上“专而不宽”,本次花会研究所要采取的则是“宽而不专”的研究角度,目的是希望在研究视野和切入角度方面与前人研究相比有所突破,引入和借鉴民俗学的视角和研究

方法,相信拓宽知识旨趣,加之研究角度和思路的转换,有助于在同一研究领域激发出新的问题意识和一些以往较少关注的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

### 前期准备工作

自2003年7月至今,笔者除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廊坊市图书馆、廊坊市档案馆、胜芳镇政府、胜芳镇志办公室等处搜集了大量相关文献资料以外,陆续十余次赴河北省霸州市胜芳镇进行田野考察,其中包括录音、摄像、个案专访及文献资料的调查搜集工作。通过一系列调研,现已掌握了共计1560分钟的采访录音、演唱演奏录音;400余张照片、10盘影像资料以及完整的现场工作记录。除田野工作之外,本人一方面关注学科内近年来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另外还认真阅读了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相关领域的专家著述,以积累一定的理论基础。

### 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综述

选择和确定一个研究课题,必然先要对前人的相关理论贡献进行梳理和总结。研究胜芳花会的音乐民俗,笔者学习、借鉴的理论资料和理论成果主要出自三个学术方向:

一、民族音乐学相关理论,如梅里亚姆(Alan Merriam)的经典范式、赖斯(Timothy Rice)在经典范式基础上提出的“重建型范式”以及胡德(Mantle Hood)、布莱金(John Blacking)等民族音乐学家关于音乐文化背景(context)及音乐文化传承方面的理论成果。胜芳镇会社音乐民俗研究涉及的会社音乐种类相对广泛,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错综复杂,研究中历时性与共时性并存,必须兼顾历史传统脉络的延伸与多样性民俗文化的共时呈现。因此,赖斯的“重建型范式”在具体研究阐释中的理论支撑作用尤为突出。

二、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关于宏观社会研究及农村地区民俗文化、风土研究、农村社区变迁研究、田野民俗志研究的相关成果,如施坚雅(Skinner)、布迪厄(Bourdieu)、顾颉刚、费孝通、王铭铭、高丙中、赵世瑜、董晓萍、刘铁梁等专家学者的著述。

早在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妙峰山》)、李景汉(《妙峰山朝顶进香的调查》)等早期民俗学家就已经开始关注并投身于京畿香会会社研究,对当时香会的活动特点、会社技艺类别、会社制度习俗等内容都做了细致具体的记录和分析,奠定了会社研究的社会学、民俗学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社会学家郭于华(《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力实践的解构》)、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刘铁梁(《联村组织与社会仪式活动》、《村落庙会的传统及其调整》)、赵世瑜(《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董晓萍(《田野民俗志》)以及人类学家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等,都是立足于民间社会和民间组织的民俗社会学考察,他们的研究成果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特别是在本书中反复涉及的超越乡土社会文化小传统界限之后的国家行政与民间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更是得益于民俗学、社会学研究成果对笔者的启发和提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强调对民众生活史的研究以及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理念、国外汉学界对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进程中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研究等,对我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笔者的研究也间接受惠于这些来自于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前沿理论与实践的有益影响;同时,社会学及人类学研究将吉登斯(A. Giddens)的民族—国家理论加以拓展,用以考察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社会变迁,也为本文提供了研究乡土民俗文化变迁的新思路。